

“乔治·华盛顿战略”：美为台谋划之战略路线图

祁昊天

内容提要：在错综复杂的台海问题中，“美国希望台湾怎么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子议题。本文将通过“乔治·华盛顿战略”这一概念对美国对台湾行动的期望、美国政策表现及其深层战略动机进行探讨。虽然不是公开官方文件或战略理论中的正式术语，但是“乔治·华盛顿战略”作为美国立国战争总体战略实践的总结，是其战略文化积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综合体现了美国外交、学界主流长久以来对台战略路线的期望。这一概念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美国决策精英的思考逻辑与政策倾向，影响着美台互动，并进而作用于整个台海局势。

自从台湾上演“入联公投”的闹剧以来，美国政府在2007年连续多次在公开场合重话敲打台北当局。就在一些绿营成员庆幸于布什在澳大利亚 APEC 会议上的低调表态之时，美国国务院主管两岸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 (Thomas Christensen) 于2007年9月11日再次放话，阐述美国立场和政策，再现了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回避在北京第一时间抛出“新三不政策”的一幕。¹柯庆生这篇以《一个强大而稳健的台湾》为题的发言除了场合的敏感性（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时机的紧凑感（紧跟“胡布会”），以及在闭门会后有意公之于众以外，更重要的是透露了美国为台湾所列出的一套行动指南。²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在“入联”问题以外，在台海地区的整体战略考量。

美国的台海政策包括很多层面，而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目前美国的战

1 1998年访华期间，克林顿避开了与江泽民同志在北京正式会晤的敏感时机，选择数日后在上海抛出了所谓的“新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主权国家才有资格参加的国际组织”。

2 Thomas Christensen, "A Strong and Moderate Taiwan", 柯庆生的发言稿参见美国国务院网站：<http://usinfo.state.gov/xarchives/display.html?p=texttrans-english&y=2007&m=September&x=20070911173406eafas0.198086>。

略考量中，台北被期望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美国希望台湾怎么做。如没有特别说明，本文中所提到的“美国对台政策”都是强调这一个层面。

“乔治·华盛顿战略”是本文在回答上面问题时介绍和诠释的中心概念。柯庆生发言中的两个关键词——强大和稳健，也即是“乔治·华盛顿战略”核心内涵。¹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笔者将探讨和解读美国当前以及可预期的未来对台湾政局、其两岸政策的基本态度，及其在这一基础上为台湾所设计、推荐的一套行动指南。

要强调的是，“乔治·华盛顿战略”这一概念首先是美国战略文化的积淀，其次才是其外交政策的体现。“乔治·华盛顿战略”这一提法并不是美国政策的官方用语，但它却体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深层次思想背景和相应的思维逻辑，反映了美国政策制定与执行人的一种思路。

本文分为五个主要部分：首先，笔者将介绍“乔治·华盛顿战略”这一概念，并解释其背后所体现的美国战略文化积淀，以及这一战略思路投射到政策方面的影响。在第二部分中，笔者将详细分析目前美国对台战略指导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笔者将综合美国全球/地区战略最高目标与基本目标两个层面探讨美国为何期望台湾选择“乔治·华盛顿战略”；在第四部分中，结合一系列战略指导本身的特点和台湾岛内政治、社会生态的演变，笔者将分析美国的战略指导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最后，笔者将对“乔治·华盛顿战略”这一思路的可行性做简要评价，并对这一政策思路的延续性和变数进行初步展望。

一、“乔治·华盛顿战略”：生存而非取胜之道

本文所要使用和诠释的“乔治·华盛顿战略”，并非“华府战略”或“美国战略”的代名词，而是指以美国开国元勋、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名字命名的一套以弱“胜”强的战略。这一战略的基本要旨是在两股势力的角力中，相对弱小的一方以保存实力、避免主力决战为基本原则，配合其他非正面冲撞的手段例如倚仗外部势力的最终介入，或以拖待变，最终寻求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一战略要求确保自身生存，而非必须在交战中取胜；倡导以拖待变，而非积极进取。

在美国的军事思想或战略思想中，“乔治·华盛顿战略”这一提法并没有被广泛写进教科书或经典著作而成为大范围使用的战略或政策固定用法，但却体现了其战争史和战略文化积淀的一部分。具体到台湾问题，其内涵和原则体现在很多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策士的观点中，作为博弈中实力相对较弱一方的生存

¹ 通过后面的讨论，我们将明确这里所谓的“强大”是一个弹性概念。对于博弈中较弱的一方，只要能够达成守成的目标，即使处于实际的相对弱势，也是足够强大的。

进而取胜之道。¹“乔治·华盛顿战略”的思路能够很好地协调当前美国对于维持“和平现状”的需求以及台湾自保甚至渐进式法理独立的目标,体现了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的实质,代表了美国向台北推荐的战略路线指南的精神。²

“乔治·华盛顿战略”这一提法是对乔治·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军事实践的一种归纳。华盛顿是为美国人所敬仰的开国领袖,但是作为一名军人,他的战争经历却并没有太多精彩篇章。其大多数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既无开创性、也对军事历史没有什么深远影响。之所以被奉为战争英雄,大体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³首先是他所主张的革命概念和坚持不懈的斗志。他的人格激励了军队,使大陆军能撑过漫长而艰难的战争。第二,人们普遍认为华盛顿选择了(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一条基本有效的应对优势英军的策略,无论该策略是否为当时最好的选择。在早期的几次败仗之后,华盛顿便一直努力避开与英军主力的正面交锋,避免了大陆军可能面临的决定性失败甚至投降。他相当了解大陆军的弱点,虽然在福奇谷整训之后大陆军的战力和军事素质明显提高,但总体而言,相对的弱势使他们没有进行过于冒险行动的本钱。第三,基于以上这些现实,华盛顿认为这场独立之战将会最终经由外交途径取得胜利,而不是凭借士兵的生命。综合起来,华盛顿所部大陆军在战争的关键时期以自保而非歼敌为首要目标,以战略战役“转移”而非作战为自保途径。其间辅以外交(特别是寻求法国的同情与支持)为主的非战斗手段,最终迫使英国失去了拖下去的决心和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

“乔治·华盛顿战略”的思路能够很好地协调当前美国对于维持“和平现状”的需求以及台湾自保甚至渐进式法理独立的目标,体现了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的实质,代表了美国向台北推荐的战略路线指南的精神。

1 这类观点的代表作包括,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S-PRC Relations*, Stimson Center, 2003; Michael Chase, "US-Taiwan Security Cooperation: Enhancing an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in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 *Dangerous Strai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63-185; Bruce Dickson, "Taiwan's Challenge to US Foreign Policy," in Bruce Dickson & Chien-min Chao, *Assessing the Lee Teng-hui Legacy in Taiwan's Politics*, M.E.Sharpe, 2002, pp. 264-284; Richard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Brookings, 2005; Richard Bush, *At Cross Purpose: US-Taiwan Relations Since 1942*, M.E.Sharpe, 2004.

2 笔者最初接触“乔治·华盛顿战略”的概念及其对美台海政策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通过对 Michael Green 进行的一次访问。Michael Green 曾任小布什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现任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日本项目主任。

3 关于华盛顿的军事生涯、他的战略思路、及其对日后美国军事思想传统的影响,参见 Victor D. Brooks and Robert S. Hohwald, *How America Fought Its Wars: Military Strategy from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Da Capo Press, 1999, Ch. 2, 4, 13; Dennis M. Drew and Donald M. Snow, *The Eagle's Talon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t War*, Alabama,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ir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9-78, 369-398; Richard Norton, *Patriarch: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New American Nation*, Houghton Mifflin Books, 1993, pp. 44-45; Russell Frank Weigley, *The American Way of War: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Ch. 1.

二、美为台设定的战略方针

为了维持符合美国利益的“不统不独、不战不和”僵局，“乔治·华盛顿战略”的思路体现了美国所期望台湾当局采取的战略姿态。¹美国的这一态度并不完全是最近几年的新变化。早在两蒋主政时代，美国这一战略思路体现在对协防金门、马祖的半心半意（例如在八·二三炮战期间），以及对台北单方面发展战略进攻能力的否定，后者包括华盛顿制止台湾的中远程导弹和核武器计划。²最后一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安克志 (Leonard Unger) 刚刚回国之后的一篇文章便反映了美国当时是何等地庆幸于台湾当局在失去国际政治空间后未采取冒进政策（如加速核计划），进而确保了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的成果。³

阻止两蒋时代的“反共复国”和攻势姿态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统一的反对。⁴而当台北的两岸政策主轴在李登辉和民进党主政的二十年间逐渐由终极统一变为终极独立时，体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以小博大策略的“乔治·华盛顿战略”思想便逐渐由牵制统一转向牵制独立（并不等于肯定统一）。两蒋时代美国对急进统一的牵制，很类似目前其对独立躁进的否定。需要说明的是，当下美国希望台湾所采取的这一战略姿态，虽然是建立在否定独立的基础上，但是这一独立仅仅限定于“法理台独”。确保事实上的独立（*de facto independence*）正是“乔治·华盛顿战略”的核心目标。

伴随着近十余年大陆经济与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巨大变化，华府很多官方人士或民间学者根据“乔治·华盛顿战略”的思路，不断向台北灌输军事和政治两个层面的自保应对策略：

首先，政治上不要轻言挑衅，而要保存实力。在这一点上，最近招致美国不

1 如前所述，“华盛顿战略”并非正式官方术语，但是它所反映和体现的战略思路却表现在很多政策宣示的字里行间，例如 Thomas J. Christensen, “A Strong and Moderate Taiwan,”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Defense Industry Conference, Annapolis, Maryland, September 11, 2007; Clifford A. Hart,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Defense Industry Conference, Denver, Colorado, September 12, 2006; James A. Kelly, “Overview of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testimony at a hearing of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April 21, 2004.

2 参见：David Albright and Corey Gay, “Taiwan’s Nuclear Nightmare Averted,”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54, no.1 (Jan.-Feb. 1998); 关于最近解密的相关美国国家档案，可参见 William Burr ed., “U.S. Opposed Taiwanese Bomb during 1970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221*, <http://www.gwu.edu/~nsarchiv/nukevault/ebb221/index.htm>

3 Leonard Unger, “Derecognition Worked,” *Foreign Policy*, No. 36 (Autumn 1979), pp. 105-121.

4 通过设定极限条件，美国一些学者尝试探讨了一些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刻意回避的问题，例如对于海峡两岸统独的意见。参见 Nancy Bernkopf Tucker, “If Taiwan Chooses Unification,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are?,” *Washington Quarterly* 25/3, 2002, pp.15-27. 通过非正式场合与一些美国前任涉台人士的私人交流，例如前任 AIT 理事主席或美国国务院负责台湾事务官员，笔者提出“如果1949年败退台湾的是共产党而非国民党，美国会不会支持统一？”这一问题时得到的答案基本都是“Yes”或“愿意考虑”。

满的例子便是2006年台湾当局的“废统”以及当下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鼓动造势。对于这类激烈动作,美国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不满,甚至不惜采用一些不符外交惯例,更不符合美台互动传统的浅白辞令,俨然一副训斥泼皮无赖的姿态。出于共尊“民主大旗”的心理,美国对于台北动员民意打法理台独擦边球的行为常常显得态度暧昧,对于台北在民主伪装下进行选举性政治运作的批评也往往比较迂回。因此改从功利的角度,华府幕僚和政府外脑不断地劝诫台湾官员和学者,认为扁式挑衅性政治运作、终极台独的政治主张即使符合民主和自决原则以及台岛本土意识,对于台湾的安全甚至独立前景(虽然美国至少目前很乐于维持现状)却都显得非常缺乏策略性。按照这一逻辑,美国认为即使挑衅性的行动能够临时涉险过关,长远来讲台北当局也会吃亏。他们“设身处地”地为台湾着想,认为最恰当的方式应以自保为首要目标,以拖待变。

美国认为即使挑衅性的行动能够临时涉险过关,长远来讲台北当局也会吃亏。他们“设身处地”地为台湾着想,认为最恰当的方式应以自保为首要目标,以拖待变。

第二,作为“拖”字诀的必要前提,台湾必须加强军事力量建设。¹这一点乍看起来似乎与第一点矛盾。而关键就在于美国认为台湾的军备建设应当以被动防御为主而非建立在具有政治动员目的的攻势“反制”基础上。从技术角度来讲,当代很多军事装备其进攻和防御功能已经非常模糊,模块化的设计和使用方式的差异往往可以实现防御、进攻潜力在战术层面上的转变。但是从总体军事战略角度而言,两者仍有区别。²基于这一点,多数美国安全专家都认为台湾可以通过比较纯粹的防御手段提高其生存几率。他们相信这种防卫不仅有效而且相对“便宜”。这一派意见尤其体现在敦促台湾加强战略性永备工事的建设。在美国开出的处方中,通过大力修建永备工事,实现全岛堡垒化、机场地下化、滩头阵地化,台岛能够极大地发挥防御优势,尤其是防空、反潜和早期预警能力的改进是提高其防御能力的重中之重。³鉴于台岛有限的战略纵深和相对缓慢的军力发展,

1 也即柯庆生所谓 Strong 和 Moderate 的统一。

2 关于在战术与战略环境下,对进攻与防御能力的分析,请参见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20, No.2 (January 1978), pp.167-214; George H. Quester, *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7;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ter 6;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 4 (Spring 1998), pp.5-43; Charles L. 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Spring 1998), pp. 44-82; Sean M. Lynn-Jone,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 4, No.4 (Summer 1995), pp. 660-691.

3 通过不同的场合和途径,美国官员与学者多次表达了支持台湾加强被动防御能力建设的态度。例如: David Shambaugh, "What Taiwan's Military Really Need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22, 2000; 美国国务院转引国防部观点 "Defense Official Says Taiwan Faces Serious Security Challenges," <http://usinfo.state.gov/eap/Archive/2004/Jun/30-256366.html>; Peter Brookes, "The Challenges and Imperatives in Taiwan's Defense," 2003年1月9日台北“台湾的安全与空中力量”会议发言。

美国显然并不指望台湾可以在任何模式的台海战争中独自生存。因此,防御而非进攻、自保而非突进的拖延战略便成为美国所期望台湾在未来台海冲突想定中所采取的“合作”姿态。他们认为,基于大陆目前甚至中长期多军种协同作战能力和装备水平,只要措施得当,在常规作战条件下,台湾很有可能完成当年马奇诺防线和大西洋壁垒未能完成的任务。

第三,基于以上军事够强¹、政治稳健的前提,美国认为台湾完全有可能在必要的形势下最终“拖疲”对岸或在关键时刻凭借外交等非作战手段达成战略目的。这一点上,他们的一条基本建议便是以意识形态挂帅,建立和巩固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达成一种“精神同盟”的关系。任何台湾方面的急进之举在美国看来,都会使得台北潜在的盟友失去对其提供支持的基础。

这种以拖代进,以守代攻思路的最近体现便是 F-16C/D 出售问题。²2007 年 5 月,台湾立法院通过“中央政府总预算”,有条件地通过了“凤隼案”第一年预算,预计采购 66 架 F-16C/D 型战机,作为过渡到下一代战机前,填补空军战力不足的方案。但是 7 月份赴美接洽采购案的台“参谋总长”霍守业却吃了闭门羹。根据“预算案”规定,军方必须于 10 个月内获得报价,否则相关资金撤回国库。而华府则传出消息,国会最早有望在明年 3 月之后才会对此案放行。如此一来,“凤隼案”在目前台北行政当局的任期内无异于已被冻结。

美国所希望看到的
的是一个以被动防御
为基本战略的台湾,
而不是一个需要良好
攻击能力的攻势军事
力量。

抛开美国惩罚陈水扁政府以及可能向大陆做姿态等政治性考虑不谈,F-16C/D 在技术和战术上的进攻特性本身也是美国拒绝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³正如美台军事战略互动历史所表明的,美国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以被动防御为基本战略的台湾,而不是一个需要良好攻击能力的攻势军事力量。在看待矛或盾的问题上,美台之间始终存在分歧。⁴

三、战略背景:一座小岛,两个大陆,一盘大棋

“乔治·华盛顿战略”所体现的为台湾所设计的行动指南是美国综合战略思考的体现。美国不愿为扁当局两岸政策背书的行动体现在最近几年以“压扁”为

1 “强”是基于防御需求而言,而并非在两岸之间达到技术、力量完全对等的军事平衡。

2 关于美台在出售 F-16C/D 问题上的近期发展,参见相关报道,“不满扁政府冲撞两岸政策,美可能叫停 F-16 战机采购案”,《联合报》2007 年 7 月 16 日;台湾政府官方新闻公告:“MND mulls US\$4b budget for 66 fighters”,<http://www.english.gov.tw/TaiwanHeadlines/index.jsp?catid=8&recordid=96951>。

3 关于 F-16 各型号的性能和战术用途区分,参见 Robbie Shaw, *F-16 Fighting Falcon*, Motorbooks International, 1996。

4 在美国的压力下,台湾多次获得进攻性武器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典型的例子包括台军于 20 世纪设计立项的天马型地地导弹,该项目在美国的压力下最终中止发展。参见海军司令部:《今日台湾》,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 年 3 月,第 230、231 页。

特点的台海政策。但是长远来讲,“压扁”不等于“压台”。美国的台海政策始终“以应变为不变”,以维持“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所谓“现状”僵局为目标,呈现某种“模糊性”。美国众议院一度有意要求美国政府说明台湾关系法及三个联合公报的适用优先级,但受到行政部门强力运作而停止。

这种“模糊性”在操作层面上体现了华府不同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思想导向差异,以及各个时期美国内政外交总体布局的不同优先次序。而在战略层面上则根源于美国对于美中博弈过程中最高战略目标与基本战略目标的不同考量。

其最高战略目标首先在意识形态层面表现为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东亚地区)推行美式“自由民主”价值观;而在现实利益层面则一方面在政治上表现为对中国这样的潜在对手“斗合并举”,另一方面在西方主导全球的核心阵地——金融财经领域——时时准备逼迫任何一个潜在对手就范。¹具体到台海问题,在基本战略目标层面,面临不可预期的岛内外局势,确保该地区的相对稳定是美国基本目标的集中体现。这样一方面能够保证美国在目前相对优先的其他战略领域得以拓展,例如地缘政治层面的中东地区 and 经济发展层面的中美“合作”;另一方面,相对稳定的台海局势也能为其实现最高目标铺路。维持稳定并非仅仅是华府政策宣誓中的陈词滥调,而是其一盘大棋中的关键性一步。

美国的政策目标构成比较复杂,但其对台北当局的要求却相对清晰,便是保存实力、减少挑衅。这样一来,在实现基本目标层面,美国能够得到该地区的稳定,加强华府与北京在其他战略领域互动的砝码;同时确保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短期更为迫切的战略方向上。就最高目标而言,其一,在意识形态层面华府认为台北某些政客不断挑衅性的政治操作所造成的岛内政治乱象与经济滑坡严重损害了台湾作为美国政治理念代言人的地位,不利于华府长期“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推广;其二,在最高目标的现实政治层面,台海安全系数的降低和美国被拖下水的可能性,有损华府与北京目前“斗而不破、和而不亲”的政策基调。向台湾推销的“乔治·华盛顿战略”及其所体现的战略路线指南正是这一系列政策目标的思想背景。

四、来自岛内的困难与阻力

在“推销”其战略思路时,美国受到来自台湾内部强大的困难和阻力。军事

1 关于美国经济体系、金融体系以及全球战略的相关观点,可参见 Murray N. Rothbard, *Wall Street, Bank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enter for Libertarian Studies, Inc, 1996; Randy Martin, *An Empire of Indifference: American War and the Financial Logic of Risk Management*,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arles R. Geisst, *Monopolies in America: Empire Builders and Their Enemies from Jay Gould to Bill G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Murray N. Rothbard, *A History of Money and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2; Murray N. Rothbard, *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Right*,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7; 房宁:“美国政治决策过程分析”,《战略与管理》,1991年第6期,第84—87页。

方面的困难主要来自台北现行“国防”战略的方向和基调；而政治上阻力则主要产生于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变迁。

抑制性威慑 VS 报复式威慑

在推销和实现这一战略思路的过程中，美国遇到了来自台湾岛内的强大阻力。首先表现在台北的军事战略上。实现“乔治·华盛顿战略”和保存实力以拖待变的策略依靠“拖”为手段，而实力是坚实的后盾。针对台湾近十余年的军备力量建设，美国人从来不讳言其不满。他们对台湾的批评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认为相对于大陆最近十余年在军事装备、训练，以及国防思想上的发展演进，台湾基本上是原地踏步。长此以往，不用说自扁当局上台以来开始实施的攻势反制战略，即使是华府乐见其成的比较纯粹性的防御反制恐怕也做不到。¹

第二，美国对于台湾“国防”建设的泛政治化极为不满。华府认为岛内蓝绿两阵营在“国防”问题上均缺乏政策的连贯性，台上一套台下一套，互相“呛声”、拆台。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军购问题上。过去作为反对党的民进党在加强军备问题上曾经不断指摘主政的国民党。而在庄家轮替之后，蓝营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开始炮轰其曾经长期诉求的军备计划。华盛顿的精英们很清楚，台湾这个部分从自己那里拷贝过去的政治体系在从威权向民主过渡的初期几乎必然会带来道德和原则的沦丧。但是岛内的泛政治化对美国通盘大棋的破坏是华府不能容忍的。这也才有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主任杨甦棣2006年一番吆五喝六、令台湾民众感到“有辱国格”的发言。当然，催促军购在美国国内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金融集团、军工集团和政界等领域“精英集合体”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不过在这一问题上，利益的追求与战略布局“恰巧”形成了交会。

第三，美国认为泛政治化的台湾“国防”战略缺乏明确而得当的方向。而这一点对于建立坚强的实力后盾以实现“华盛顿战略”是最致命的硬伤。美国很多专家认为台湾在军事上“本应”能够通过强化防御式的防卫能力使台岛“不可攻陷”。“本”，表明他们对于陈水扁上台以后抛弃守势防卫战略不赞同，认为陈妄图通过提升进攻性报复手段以威慑吓阻大陆的战略意图无法实现。而“应”，则体现了美国防务专家对于台湾实现要塞化后防御能力的信心。

台湾目前受到美国鼓励和催促的很多“国防”动作，例如加强机场洞库化、

¹ 2000年6月16日，陈水扁以“总统”身份首次宣布“决战境外”的作战指导思想，强调要将“守势防御”调整为“攻势防御”，2002年台“国防部”公布的《国防报告书》首次正式将“拒敌于境外”的攻势作战确定为台军军事战略，甚至强调在必要时进行“预防战争”。而陈水扁在竞选期间便在其《国防政策白皮书》中阐述了向“攻势战略”转变的政策，参见林正义：“台湾总统选举对国家安全与外交的影响”，《国策专刊》，2000年5月19日。

强化防空能力、提高美日台指控通情系统的连通、提升联合反潜能力等等,都可以被视为一种以消耗防御力的方式换取战略力量保存思想的体现。美国人清楚,台海一战对于大陆而言不战则已战则必速决,也就是当前解放军拳头部队所瞄准的“首战即决战”。因此,台湾自身在可能的冲突中只要拖得住就有可能挺得住。台湾异想天开的突进,无论是平时政治性还是战时军事性的,在美国看来都有方向性错误。

台湾异想天开的突进,无论是平时政治性还是战时军事性的,在美国看来都有方向性错误。

从战略理论层面来讲,美国认为这一方向性错误的实质在于台北未给予抑制性威慑(通过提高对方行动的代价而慑止之)以足够重视,反而天真地妄图以报复或惩罚式的手段来威慑大陆(报复式威慑,通过增强己方承受打击后发动报复反击的能力而慑止敌方)。¹抑制性威慑相对更侧重于防御性,而报复式威慑则依赖鱼死网破的能力和决心。对于台北当局不时叫嚣的“决战境外”甚至先发制人打击大陆目标这类充满政治造势目的的攻势宣誓,美国也就更不能接受了。²

前段时间,台“国防部长”李天羽公然要求和鼓励台军学习日军当年偷袭珍珠港的勇气,演练以突袭大陆重要目标为主要内容的“毒蝎计划”。³在“入联”造势的喧嚣声中,这一言论并未在两岸和美国的外交、媒体界引发很大的反响。但是这一计划从曝光伊始便未能得到来自美国的支持。⁴而与此相反,9月初选战中的马英九首次公布了其意向中的军事政策。该政策的一大特点便是改变目前扁政府推行了多年的攻势姿态而代之以守势。⁵目前还没有明确证据能够说明马英九的这种回归守势的军事思路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或压力。台军事战略的演进与美台互动的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

台湾政治“泛扁化”

除了前面提到的美台目前对于台北军事战略的不同意见以外,华府所提供的

1 关于两种模式威慑的分析见诸很多讨论威慑理论和实践的学术作品,例如:Lawrence Freedman, *Deterr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pp. 34-40, 60; 另可参考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atrick Morgan, *Deterr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7; Robert Jervis,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2 在其2006年的《国防报告书》中,台军方遵照“国家安全委员会”《2006国家安全报告》的原则,再次重申了“有效吓阻”和相应发展进攻性打击力量在台军事战略中的首要地位。

3 1999年被首度提出的“毒蝎计划”于2003年第一次被曝光,参见首次媒体报道:“全战备‘毒蝎计划’锁定中共十大城市”,《新新闻》,2003年10月20日。

4 还像前面说的,美国经常对台湾批评得比较“暧昧”,体现了柯庆生这次演讲中强调的不愿造成干涉台湾内政的影响。因此,不支持本身就体现着否定。

5 关于马英九的未来军事战略纲领原文,参见:《打造精锐新国军 确保台海无战事》,马英九竞选官方网站: http://www.ma19.net/client/NewsDetail.php?TYPIDJump=00af87f9y84zhfd2&NewsDOCID=00am79hmx51yb82h&Page_Num=2。

战略指南其更多的挑战来自岛内的政治生态。

美国关于取守缓进的战略建议至少短期内无法完全被台湾所接纳。这主要是由于台岛内部的三个因素的制约。其一，是美国人对台北执政者“理性假设”的不成立；其二，是民进党基本教义派对整个绿营愈加明显的挟持；¹其三，是岛内本土意识的上升和民粹主义的抬头，及其对蓝绿两个阵营产生的影响。

**“乔治·华盛顿战略”所面临的
最大尴尬可能来自台北
那些根本不在同一思维
逻辑下操盘的政治人物和
他们背后的岛内情势。**

扁当局很多的挑衅性行动都不能被看作台独长远演进或台湾安全的审慎战略谋划。作为一个缺乏基本政治道德的政客，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和为绿营继续执政造势（至少为确保其自身贪腐弊案、一家人的官司将来不被翻案）才是他最近三年频频越线的背后动机。结合岛内呈急速上升的民粹思潮以及伴随的岛内对华府愈加的不满，美国对台北的控制已比以往困难了许多。“乔治·华盛顿战略”所面临的最大尴尬可能来自台北那些根本不在同一思维逻辑下操盘的政治人

物和他们背后的岛内情势。

陈水扁在2007年8月底过境美国遇到了非常尴尬的待遇。然而，任期所剩无几的陈水扁想必已不会真地再将“过境外交”这类来自美国的恩惠视为得分，美国在扁当局余下的时间有可能完全失去对他的牵制，这一点表现在扁无视华府反对在“入联公投”问题上的一意孤行。华府对此其实看得很清楚。他们早已将目光投向了2008年凯德格兰大道的新主人。无论是相对扁要稳健但却善变的谢长廷，还是时时担心“外省原罪”而陷入自相矛盾的马英九，相信华盛顿的支持原则应该是很简单的，那便是在统独这类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议题上坚持守成，最多只能徐图缓进并知难而退。

在将目光投向2008年台北新主人的同时；对于华府来说，最现实的挑战在于如何应对扁当局和渐由深绿势力“绑架”的民进党给未来台湾所留下的政治遗产。民进党的基本教义派在2007年8月底再一次抛出了一颗危害两岸关系的定时炸弹：民进党“正常国家决议文”。无论该决议文最终通过的版本在多大程度上消除了急进台独的论调，该文件的出台和陈水扁“一言九鼎”地否决时任党主席都再一次体现了民进党由大鸣大放的民运党向原教旨主义一言堂的蜕变。台岛内部，无论是派系分裂的民进党还是决意加强本土化的蓝营，为了政治上的生存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被动地接下这类挑衅性议题。而对于美国而言，这种政治氛围则意味着无论蓝绿哪一边取得政权，说服其贯彻实施“乔治·华盛顿战略”的难

¹ 关于基本教义派或所谓的“台湾共和国派”对民进党的把持，最近的实例包括民进党今年党内立委初选时严重的内斗和新潮流系的大败，以及谢长廷最近关于国民两党公投议题合并的建议被民进党中常会严厉批驳为叛徒。关于第二个选举插曲，合并的建议实际上是谢长廷选举策略中的一环，意在逼国民党现形。但是民进党中央显然“入戏”过深，在台独、入联这些“圣战”口号下忘记了自己的公投倡议首先也是赢得选举的现实性策略。

度都有可能加大，以至于形成台北表面上受华府影响，而实质却完全受制于岛内急进的本土思潮。¹

不过在这一问题上，2008年1月的台湾“立法院”选举似乎透露了一些新信息。民进党在这次选举中的历史性大败由很多不同的因素导致，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岛内大多数没有强烈统独取向的所谓“中间选民”厌倦了近几年绿色政权所一再挑弄的政治性议题。反贪腐公投与讨党产公投的双双不过关也向岛内民众传达了一条重要信息：那便是向被政治操弄的公投假议题说“不”并不会因违背台湾主体意识的偏激政治正确性而被否定。这一新变化为2008年3月份的“总统”大选和“入联公投”，乃至未来四年内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投下了更多的不可确定性。

然而，无论激进的意识形态操弄是否会随着某些出于私利而挑动民粹的政客的下台而趋向缓和，经过了多年族群动员、统独议题操弄、行政干预司法、及台湾悲情意识的操弄，在岛内已经衍生出一种泛选举化的政治生态，而这种生态所造成的社会动员和情绪动员已非单纯的选举时期的特征。

五、总结与展望

除却上面讨论的岛内因素，从技术操作层面上来讲，“乔治·华盛顿战略”思路的可行性本身是值得推敲的。因为它所主张的防御性战略姿态能否达到预期的防卫效果和以拖待变的战略意图是成问题的。这里涉及非常复杂的两岸军力对比计算、不同想定下作战过程的演进、外部势力介入的力度、甚至自然因素等来自不同方面的影响。但是正如前一部分所分析的，当前和未来美国推销这一战略的难度将首先来自台湾岛内。不过尽管存在各种阻力，美国的未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将是目前政策的延续，因为选择这一战略思路对于美国来说是综合考量其基本战略目标与最高战略目标之后的审慎之举。而一旦在2008年岛内的“总统”大选中出现政党轮替，由苏起这类马英九身边的稳健派国政智囊所操刀的国防战略，

无论蓝绿哪一边取得政权，说服其贯彻实施“乔治·华盛顿战略”的难度都有可能加大，以至于形成台北表面上受华府影响，而实质却完全受制于岛内急进的本土思潮。

¹ 民进党2007年9月30日全代会所通过的所谓“妥协版”决议文回避了“国号正名”这一敏感提法，并“逼”退了代表深绿派的时任主席游锡堃。虽然这些举措被认为有可能存在美国压力的因素，但是相对于向美低头，如何更有技巧地迎合或操弄岛内势力显然被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

想必将更契合于“乔治·华盛顿战略”所体现的思路。¹

对于大陆而言，“乔治·华盛顿战略”或类似的主张不应简单地被视为华府对北京的协助或背书。还以 F-16C/D 问题为例，缓售不等于不售。退一万步，即便将来美国向台北推销更先进的军机也并不一定意味其战略思路的根本调整。因为一方面，如前所述，在技术操作层面军事上的攻守界限并不是绝对清晰；另一方面，从装备下订单到交货再到成建制形成战斗力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而根据大陆科研、装备和训练的进展，未来装备的 F-16C/D 是否来得及提升台军战力，而战力的提升又是否意味着防御力的实际有效提升，都还是很大的未知数。再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如果某一天在国内的政治压力下美国果真对台出售更新更强的军备，那也很可能只是老布什当年售台 F-16A/B 时以台北钞票换国内选票的故事罢了。

国际政治除了表现为相对静态的力量均衡博弈外，同时也是一种动态的笔者称之为“麻烦均衡” (Balance of Trouble) 的游戏。对于大陆而言，了解美国是为了更好地利用美国和避免被美、台当局所制约。过多地寄望于美国没有绝大的必要，因为极度消耗北京各种资源的台湾问题永远可能是美国乐见的“麻烦选项”。只是对美国来讲，这个北京面对的麻烦制造者既要“强大”，更应“稳健”。

(作者：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1 参见 Su Chi (苏起), "Taiwan's National Security: A KMT View,"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Sep. 10, 2007, 即本文开头所提到柯庆生发言的那次会议; Su Chi (苏起), "The Need for A Peace Accord," *China Times*, Oct. 27, 2006, p. A19; Ma Ying-jeou (马英九), "Taiwan: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 2006; Vincent C. Siew (萧万长), "Toward a Strong, Moderate and Positive Taiwan,"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Washington DC, Oct. 5, 2007; *Defense White Paper of the KMT: A New Military for a Secure and Peaceful Taiwan*, September 2, 2007.